

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

THE STRUGGLE FOR SOVIET JEWRY IN AMERICAN POLITICS

Israel versus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

透视以色列与美国当权派的关系



Fred A. Lazin

[以色列] 弗雷德·A. 拉辛 著

张淑清 徐鹤鸣 译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文丛 第十一辑
江苏高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成果

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

THE STRUGGLE FOR SOVIET JEWRY IN AMERICAN POLITICS
Israel versus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

透视以色列与美国当权派的关系

[以色列] 弗雷德·A. 拉辛 著

张淑清 徐鹤鸣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 / (以)拉辛著;张淑清,徐鹤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ISBN 978-7-100-08959-3

I. ①美… II. ①拉…②张…③徐… III. ①政治—研究—美国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876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

[以色列]弗雷德·A.拉辛 著 张淑清 徐鹤鸣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08959-3

2014年5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张 31

定价: 65.00 元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文丛
编辑委员会

主编：徐 新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张倩红	张淑清	肖 宪	宋立宏	陈贻绎
孟振华	钟志清	洪修平	徐小跃	徐 新
黄陵渝	殷 罡	傅有德	赖永海	潘 光

Samuel Heilman Anson Laytner

Aharon Oppenheimer David Stern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文丛》

总 序

2008年,中国的犹太学研究界迎来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全面开展20周年纪念。诚然,从广义上说,中国的犹太学研究之萌芽完全有理由追溯到100年前,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曾有若干关涉犹太文化方面的文章、书籍面世,这在中国可是第一次,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接触犹太文化并对之产生兴趣。不过,稍加分析便可看出当时的文章书籍主要是个人偶尔之作,或一时之兴所为,很少能够看到这些学者的后续之作,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全身心投入犹太文化的系统研究,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有计划推进这一研究在国内的开展。30年代后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消退也就十分自然。

1978年在中国开启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新一代学者对犹太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毕竟,西方社会是与犹太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走向世界的中国显然需要了解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犹太文化。在这一背景下,犹太文化研究再次在中国开展也就十分自然。不过,严格说,真正有意义的中国犹太文化研究尚只有20年的历史。它起始于80年代末,到了2000年后逐步形成高潮,几乎涉及犹太文化研究的所有方面。回顾历史,中国犹太文化研究在过去20年中取得的成就(也是我们界定犹太文化研究全面开展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专门研究机构组织的出现

专门从事犹太文化研究的机构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犹太文化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无论是80年代末成立的上海犹太文化研究会,中

国犹太文化研究会,还是 90 年代成立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有关高校的犹太文化研究中心,都是这样的机构和组织。很显然,组织机构是事业推进的最有力保障。

2. 犹太文化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版和发表

据不完全统计,20 年来,我国已经出版的涉及犹太文化各个方面的书籍在 600 部之上。国内众多出版社都加入这一出版活动。而已发表的论文更是超过了 1 000 篇。从核心学术刊物到流行报刊,从综合性的到专业性的,从全国性的到地方性的,从学报到普及性的刊物都有。其中具标志性和有影响的成果有:顾晓鸣主编,上海三联出版社在 90 年代陆续出版的近 20 部的“犹太文化丛书”,徐新、凌继尧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于 1993 年出版的首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以及傅有德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在 1996 年后陆续出版的“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在显示我国犹太文化研究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有力说明了犹太文化研究在国内的普及和提高,以及中国学者对这一学科的了解和把握。

3. 犹太文化研究国际交往的增加

迄今为止,中国已经举办了十余次犹太文化研究的国际会议,外出参加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的人次更是不胜统计。无论是中国学者的走出去,还是国外学者的请进来,无论是在国内举办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还是到国外参加国际会议或学术活动,这类国际交往显然体现了中国犹太文化研究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4. 犹太文化研究在高校的开展

在高校中开展犹太文化研究和教学是中国犹太研究深入开展和将犹太研究引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众所周知,高质量的研究只能出于专业研究人员之手,高校自然成为犹太文化研究的主力军。因此,到目前为止,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研究成果出自高校也就不足为奇了。高校中开展的犹太文化研究还突出地表现在犹太文化课程的开设和犹太文化研究方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收和培养上。高校中犹太文化课

程的开设和人才的培养是确保我国犹太文化研究人才辈出和源头活水不断涌入的根本保证。

90年代初成立的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是国内高校中最早对犹太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同时享有较高国际知名度的文科研究机构。该研究所的建立是为了满足中国学术界日益增长的对犹太文化了解的需要,并推动犹太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在国内,特别是在高校系统的进一步开展。近20年来,该研究所不间断地开设一系列犹太文化课程,涉及犹太历史、文化、宗教、社会、民族、反犹主义和纳粹屠犹等方面,招收和指导犹太历史文化和犹太教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数十名,有力地促进了犹太文化教学在大学的开展。其自身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人民了解犹太文化的重要信息和资料来源,被视为中国犹太学研究领域的领跑者。

组织撰写、翻译出版犹太文化研究方面的书籍一直是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先前并没有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但是,无论是涉及犹太文化各个方面的大型工具书,如有200余万字、1995年获得全国图书奖最佳工具书奖的首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还是学术专著《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犹太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犹太人的故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或者包括《现代希伯来小说选》(漓江出版社,1992年)、阿格农的《婚礼华盖》(漓江出版社,1995年)、阿尔弗雷德·高乔克的《理性之光——阿哈德·哈姆与犹太精神》(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马丁·吉尔伯特的《犹太史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丹·巴哈特和本·沙洛姆的《以色列2000年:民族和地域的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雅各·马库斯的《美国犹太人:1585—1990年,一部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拉海尔·伯恩海姆-弗里德曼的《地窖里的耳环》(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沙洛姆·约冉的《抵抗者:一个真实的故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犹太人告白世界——塑造犹太民族性格的22篇演

讲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大卫·格罗斯曼的《狮子蜜》(台湾大块出版社2007年)、撒母耳·科亨的《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等在内的译著,都为国人了解犹太文化和推进犹太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纪念犹太文化研究在中国全面开展20周年之际,我们决定组织出版《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文丛》,以实际行动进一步推动我国亦已开展的犹太文化研究。该文丛的规模初步定在20本上下,作者既有中国学者,也包括国外学者,预计用5年左右的时间出齐。组织出版该文丛的目的是为我国广大学者、读者提供深入了解犹太文化方方面面的书籍。内容不仅包括纯学术性的理论著作,也包括面向普罗大众的读物;既涉及犹太历史、文化、民族,也涉及犹太宗教、思想。所选书目以现当代作者的著作为主,凸显时代关怀,贴近雅俗共赏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希望实现的目标。

徐 新

2009年识于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前 言

弗雷德·拉辛教授的这部巨著以其非凡的内涵,定会成为一本不可或缺的参考书。这部著作是在查阅大量文件和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其内容涉及发生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一场最伟大的、但并未受到世人广泛关注的人民运动: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和美国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与美国政治、犹太游说集团、以色列同流散犹太人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可避免地)与持续不断的中东危机都密切相关。拉辛教授的成功之处突出表现在他以公平的态度对待美国和以色列两方,虽然这样做并非易事。与此有关的各派人士都可能因他不折不扣的客观性而对他提出批评。

这本书大概不会激发人们对中东未来的乐观情绪,因为拉辛先生强调,以色列始终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以色列领导层不仅要对付巴勒斯坦人,还要对付数目繁多的美国犹太院外游说集团。直到今日,虽然在亚西尔·阿拉法特已经去世之后人们对和平进程燃起了新的希望,谈判者却仍然需要为大量无法满足的利益而斗争。这就像一场参赛双方都有十二个队员参加的网球比赛。

但这并不是我们从书中得到的唯一启迪。考虑到阿拉伯领袖们都坚信存在背后的阴谋勾结,那么这本书涉及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展开的争吵和辩论至少能够证明,民主国家的政策是通过不同派别之间尴尬的公开斗争和公众批评产生的。

拉辛教授在探讨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在苏联犹太移民问题上所起到的阻碍作用时,也清晰地描述了一个民主国家的政策是如何形成的,政治是如何运转的。因此他的著作也是对列克星敦图书出版公司“政策

ii 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

研究组织”《公共政策研究》丛书的一个贡献,因而受到广泛的赞誉。

读者可以从不同层面阅读这一杰作——不仅作为一本关于移民问题的有用资料,或者作为一本研究美国和以色列政治中权力和压力问题的作品,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民主文化的极好案例,从中更好地理解在民主文化中关于政策的争斗从来不会是有序、纯朴和温和的。至于究竟哪些人更坚守道德原则,或者谁更高尚,拉辛先生留给了读者去判断,然而我们至少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实的可行性而不是高尚的道德标准,将成为决定历史的最终力量。

保罗·J. 里奇

《公共政策研究》丛书主编

鸣 谢

我想在此对几位影响了我对美国 and 民族政治、移民以及苏联犹太人问题发生兴趣的人表达感激之情。我还想感谢同我合作使这项研究工作得以实现的几个人。

在阿姆斯特特的马萨诸塞大学,我在卢瑟·艾伦(Luther Allen)、马里奥·德皮里斯(Mario Depillis)、谢尔登·戈德曼(Sheldon Goldman)、格伦·戈登(Glen Gordon)、大卫·梅休(David Mayhew)以及路易斯·鲁查姆斯(Louis Ruchames)教授的课程中研究美国政治和历史。我在芝加哥大学跟随大卫·格林斯通(David Greenstone)、E. W. 凯利(E. W. Kelley)、泰德·洛伊(Ted Lowi)以及格兰特·麦康奈尔(Grant McConnell)继续这些问题的学术研究。

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在汉斯·J.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教授的指导下撰写了关于美国政治中的犹太人的硕士论文。我集中研究了1930年代第六区的圣约之子会对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和德国犹太难民问题的反应。杰里米·阿兹利尔(Jeremy Azreal)和约瑟夫·格罗波西(Joseph Gropsey)的指导帮助我扩大了论文的关注点,也包括了美国犹太人社团对希特勒的反应。拉比马克斯·蒂克丁(Max Ticktin)和丹尼·雷佛(Danny Leifer)安排我第一次在芝加哥大学作了学术演讲。

在我为这本书而努力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提供了合作和帮助,其中包括卡尔·格利克(Carl Glick)(希伯来移民协助会)、拉尔夫·戈德曼(Ralph Goldman)(美国联合分配委员会)、唐·欧文(Don Irvine)和史蒂夫·索兰德(Steve Solender)(犹太社团联合会)。纽约公共图书馆

ii 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

多罗特(Dorot)犹太部的工作人员也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

一些同事给了我鼓励、启发和指导。他们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部的萨姆·阿罗尼(Sam Aroni)和乔尔·阿伯巴赫(Joel Aberbach);巴鲁赫(Baruch)大学的亨利·费恩戈尔德(Henry Feingold);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李·西格尔曼(Lee Sigelman);本-古里安大学的阿龙·盖尔(Alon Gal)和本杰明·平库斯(Benjamin Pinkus);亨特大学(Hunter college)的罗伯特·塞尔泽(Robert Selzer)和肯·谢里尔(Ken Sherril);希伯来大学的艾拉·沙朗斯基(Ira Sharkansky);以及罗格斯(Rutgers)大学的马克·霍尔泽(Mark Holzer)。特别感激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的阿里斯蒂德·佐尔伯格(Aristide Zolberg)对我的研究的关心、支持和鼓励。

我要感谢赫斯特(Hurst)家族成员——阿兰(Alan)和林达(Linda),史蒂夫(Steve)和索尼(Sonny),大卫(David)和梅里萨(Melissa)——感谢他们在我担任地方政府的莱恩和劳埃德·赫斯特(Lynn and Lloyd Hurst)家族委员会主席期间对我的一贯支持。他们的支持对我从事这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

我要感谢我在本-古里安大学的研究助理阿耶莱特·海姆普尔-祖克曼(Ayelet Haimpur-Zuckerman)、埃迪·哈达德(Etty Hadad)以及利塔尔·格伦德兰德(Lital Grundland),他们帮我做了大量文献查阅和资料审校工作。

最后,我想对我的妻子雷切尔(Rachel)表达特别的谢意,她自始至终鼓励我坚持和完成这个项目。她愿意在夏季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去授课,使我有机会在那里进行了本项目的第一次访谈。如果我们没有去华盛顿,不知道我是否会启动这项研究。

目 录

前言	i
鸣谢	i
一、导论	1
二、将苏联犹太人问题提上美国公共议程：从漠视到杰克逊-瓦 尼克修正案出台	22
三、自由选择权原则和八人委员会：以色列和美国犹太当权 派的对抗	101
四、关于自由选择权的第二轮辩论：以色列人的第二次失败 ...	168
五、1980 年代：苏联犹太人问题倡议运动得以延续	237
六、里根—戈尔巴乔夫会晤：为解决苏联犹太人问题打开 僵局	278
七、美国犹太人问题倡议运动中的势力范围之争：犹太联盟 委员会和福利基金会确立主导地位	319
八、在苏联犹太移民问题上的最后斗争：以限额结束自由 选择权之争	342
九、美国犹太人、苏联犹太人问题倡议运动、以色列和美国政治： 美国犹太领袖重新解释其政治利益	382
附录一：统计信息	398
附录二：外来词汇与缩写	411

ii 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

参考书目	417
访谈	441
索引	447

一、导 论

1

1989年5月8日,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主席西姆查·迪尼兹(Simcha Dinitz)先生致函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称,苏联政府将允许美国当局向居住在莫斯科而希望移民美国的俄罗斯犹太人颁发签证。在此之前,苏联政府一直禁止绝大多数苏联犹太人在莫斯科申请美国签证;那些希望移民美国的人只能持以色列签证离开苏联,并经维也纳前往以色列。在维也纳,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创办的资助组织为他们提供帮助和食宿,再把他们送到罗马,并帮助他们以难民身份申请美国签证。沙米尔总理的参谋总长尤西·本-阿哈龙(Yossi Ben-Aharon)先生在1989年5月17日给西姆查·迪尼兹先生的回信中,确认以色列政府支持在莫斯科实行的新签证制度提议。^[1]

显然这一回复与以色列政府当时的官方立场是矛盾的,以色列政府一直要求所有苏联犹太移民前往以色列。几十年间,以色列历届总理都对由于苏联犹太人持以色列签证离开苏联但选择前往其他国家而造成的“流失”现象持批评意见,并要求一些美国的犹太组织停止帮助他们前往美国。^[2]不久前,沙米尔总理还在敦促美国政府停止为苏联犹太人发放难民签证。然而本-阿哈龙的信,却暗示以色列可能同意与美国和苏联政府以及美国的犹太领袖就美国接受苏联犹太难民的限额、在莫斯科发放美国签证,以及“直飞”以色列等问题达成协议。^[3]

1987—1988年,苏联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决定允许苏联犹太人自由移民之后,事实上,90%以上的犹太人都选择到美国定居,很少有人愿意前往以色列。经过协商,美国同意每年给在美有直系亲属的苏联犹太人发放4万个难民身份入境许可。而且,等积压在罗马的苏联犹太

2

2 美国政治中的苏联犹太人之争

人签证申请被处理完毕,美国就不再向苏联以外的苏联犹太人发放难民签证。这些限制减少了所谓的“流失”现象。由于大多数苏联犹太人无法得到美国入境许可,因此只能选择留在苏联或者移居以色列。截至1992年底,大约40万人选择了移居以色列。(见附录)

本书讲述的是从1967年到1989年间以色列政治领导人和几个主要的美国犹太组织在苏联犹太人移居目的地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最初以色列政府和大多数美国犹太领袖都认为,俄罗斯犹太移民问题是所谓的“阿利亚”(Aliyah)——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问题。^[4]但到了1970年代末,由于大多数苏联犹太移民都选择移居美国,这一共识名存实亡。美国的犹太社团支持这一趋势,要求美国政府承认苏联犹太人的难民地位,并为他们的重新安置提供帮助。他们在全美国范围内的很多犹太社区内组织安置点,并为这些移民提供住房、工作和医疗保障。

面对这种情况,以色列政府要求美国的犹太组织停止一味帮助俄罗斯犹太人移居美国,声称以色列需要最大数量的苏联犹太人,这些潜在的移民对于以色列的持续生存至关重要。他们强调,之前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移民大多是未受过教育的非技术移民,因此以色列有理由接收这些来自苏联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移民。以色列政府公开表示,那些持以色列签证离开苏联的犹太人应当前往以色列,并强调持以色列签证离开苏联而不前往以色列的做法会导致苏联彻底关闭这扇大门。他们还指出,移居以色列比移居美国或欧洲其他国家更有利于这些犹太移民保持犹太传统。

这种情况给美国的犹太领袖提出了一个难题。许多人对以色列需要最大数量苏联犹太移民,特别是需要受过教育的技术移民表示同情。但也有很多人回忆起大屠杀时期美国政府曾拒绝那些逃离希特勒德国的犹太人入境的历史,难道现在美国犹太社团也要阻止苏联犹太人逃离吗?而且,如果没有美国这个选项,许多犹太人可能选择留在苏联。那么将来万一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怎么办?有人还引用了历史上

营救囚犯的犹太传统(*Piduyon Shvuim*)。有人借用“自由选择权”原则为帮助苏联犹太人的行为辩护,认为移民有权选择到何处定居,以色列人和美国的犹太社团都不应剥夺苏联犹太人选择居住地的自由。³“自由选择权”原则的辩护者还指出,如果美国的犹太组织不再帮助这些犹太“流失者”,那么其他非犹太或反犹太复国运动组织就会帮助他们移居美国并得到美国政府的补偿。^[5]最后,少数犹太领袖和专业人士支持最大数量的犹太人来美国定居。一位联盟机构的官员认同和响应了这一主张,认为自 1924 年美国关闭了接收难民的大门以来,犹太社区一直没有得到补充。

由于美国犹太社团和以色列领导人的立场经常变化,情况变得非常复杂。果尔达·梅厄、伊扎克·拉宾和伊扎克·沙米尔总理在“流失”问题上立场都很强硬,但梅纳赫姆·贝京总理经常强调,那些家庭的需要和愿望比“阿利亚”更重要。他不愿要求美国政府(或其他任何政府)拒绝苏联犹太人的难民身份入境。作为总理,他要求美国犹太人不要在维也纳支持那些苏联犹太“流失者”,但应对那些自己设法到达他们所在社区的犹太人提供帮助。重要的是,以色列历届政府都默认了在苏联犹太人问题上与美国犹太当权派的分歧。^[6]尽管在这个问题上经常表示威胁和愤怒,但以色列政府始终努力同美国犹太社团友好交往。可以说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色列政要们更看重与美国犹太人(以及美国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

美国犹太当权派在这个问题上也有摇摆。1976 年 11 月,美国犹太当权派还在以支持“自由选择权”原则为由,反对以色列强迫苏联犹太人前往以色列,但到 1979 年初,几个主要的犹太联盟机构就对一些苏联犹太人定居他们所在社区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或者对那些新来者的信仰表示怀疑,或者担心定居后的费用问题(Simon 1997: 77, 78)。1980 年代末,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和苏联在犹太移民问题上调整了政策,大多数美国犹太领袖都放弃了对“自由选择权”原则的坚持。他们先是支持直飞以色列(经过布加勒斯特),后来同意美国政府